



浙江历史文化

浙江

文化地图

第一册

杨建新 主编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浙江文化地图

第一册 胜迹寻踪
浙江历史文化
杨建新 主编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出版人 蒋 恒
责任编辑 王文元
装帧设计 薛 蔚
责任校对 程翠华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浙江文化地图. 第一册/杨建新主编.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514-0021-3

I. ①浙… II. ①杨… III. ①文化史—浙江省
IV. ①K2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20420号

浙江文化地图 第一册
胜迹寻踪·浙江历史文化

杨建新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photo.zjcb.com

电话 0571-85170300-61010

传真 0571-8515957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25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0021-3

定价 200.00元

《浙江文化地图》编委会

主 编：杨建新

副主编：柳 河

编辑部主任：黄大同

编辑部副主任：蒋中崎

编 辑（按姓氏笔画排序）：王相华 王菲菲 苏唯谦 何 永
应 丹 骆 蔓 高琦华 高超云

总序

浙江，位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南端，东临浩瀚的大海，西连赣、皖两省，北与沪、苏毗邻，南与福建接壤，全境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浙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生机。从新近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迄今的漫漫万年间，浙江先民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相处与变革撞击中，创造了一个个载入史册的奇迹和辉煌，涌现出灿若群星的名人志士。同时，浙江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经岁月沧桑，形成了多元而又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为浙江赢得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

—

浙江历史悠久，2010年发现的长兴七里亭遗址，可以将浙江境内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推至100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浙江境内人类活动的范围已相当广泛。距今1万年的上山文化、7000至8000年前的跨湖桥文化，6000至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5000至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以及4000至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是浙江悠久灿烂的史前文化的杰出代表。这些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尤其是到了良渚文化时期，浙江先民们的劳动与智慧已初显人类文明的曙光。

殷商时期，北方出现了青铜文化，浙江则出现了印纹陶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浙江境内冶炼业和制陶业已相当发达，其中原始青釉瓷器的烧制，揭开了中国青瓷生产的历史。以龙泉青铜宝剑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是这一时期浙江经济文化的集中反映。

如果说，浙江文化在先秦以前还仅仅属于考古文化的话，那么，从西汉建立到南北朝终了的800年，则是浙江文化异彩纷呈的开端时期。自西汉始，

浙江文化已是光彩照人了。

东汉时期上虞著名哲学家王充的《论衡》，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解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对中国古代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学者在数学、史学、哲学方面均有较大的影响力。尤其在史学方面，史籍和史家盛极一时。

南朝时，浙江文学开始形成气候。其中谢灵运善于用诗篇刻画自然景物，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的先河。而武康人沈约则创立音韵四声，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他和谢朓等人一起创立的新体诗，开创了中国格律诗的先声。在书法艺术上，东晋时期定居会稽的书法家王羲之，以其“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体势雄健，变化多端的书风，为历代书法家所称颂，被誉为“书圣”。

六朝以来浙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浙江经济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手工业品需求量的增加，使浙江的制瓷业在三国时期以后迅速发展。而青瓷的出现，便是这种经济文化繁荣的有力佐证。浙江青瓷的发展所形成的青瓷文化，是这一时期浙江在经济文化史上崛起的里程碑。

自隋唐开始，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属于临安人钱镠建立的吴越国，境内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到两宋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浙江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繁华、富庶的地区之一。浙江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也呈现出勃勃生机。

隋朝天台国清寺高僧智顗，融合中国南北佛学的特点，创立了中国佛学六大派之一的天台宗。南北朝时期，浙江的学术思想更是异常活跃，“浙学”便是当时最主要的学术思想之一。其中南宋永康人陈亮和永嘉人叶适，反对程朱理学，主张“因事作则”，提倡功利之学，是当时“浙东学派”的代表。而南宋学者吕祖谦开创的“吕学”，又称“婺学”，曾作为“浙东学派”的中心而名倾天下。

北宋时期，浙东匠师喻皓以擅长设计、建造木塔和多层楼房著称。北宋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则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北宋杭州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沈括更是博学多才，他所著的《梦溪笔谈》不仅是一部科学史料总汇，也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典籍。

自唐初始，浙籍文学家、书法家、美术家就代有其人，显现出群星闪烁

的可喜局面。南宋时期，杭州建立画院，浙江更成为全国美术活动的中心。另外，两宋时期，浙江又是中国戏曲的桑梓之乡。杭州宋杂剧演出空前繁荣，中国完整的戏剧形式——戏文，也在温州诞生。

追求恬淡、自然的审美情趣，追求艺术的个性化发展，已成为以杭州为中心的宋代文化的一种时尚。这种意识渗透到工艺美术领域，使宋代的瓷器、漆器、印刷、冶炼、建筑等手工业产品具有鲜明的浙江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江南地区的繁荣、富庶，对浙江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的鼎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余姚人王阳明提倡的“致良知”学说，在明代中期以后曾风靡一时，对明清学术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明末清初，同为余姚人的黄宗羲、朱舜水，成为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山祖。晚清杭州学者龚自珍，则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史学家。他所提倡的一系列改革主张，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外，清末著名学者、海宁人王国维，在中国文学、戏曲、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明末清初，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浙江市井文艺勃然兴起。小说、戏曲和说唱曲艺日趋繁荣。早在元末明初，同为杭州人的罗贯中、施耐庵，创作了中国文坛上的两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戏曲领域，元代后期，杭州逐渐成为继大都（今北京）之后的又一创作中心。元代高则诚的《琵琶记》标志着南戏创作的高峰，被后世誉为“曲祖”。明清两代浙江还出现过不少杰出的戏剧家，如明代的徐渭，清代的李渔、洪昇等。他们创作的《四声猿》、《笠翁十种曲》和《长生殿》等，对丰富和发展中国戏曲艺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中杭州人洪昇创作的传奇《长生殿》，与山东人孔尚任的《桃花扇》一起，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绝唱。

元代湖州人赵孟頫书画双绝，所写碑帖甚多，其字人称“赵体”，而黄公望、吴镇、王蒙与江苏倪瓒合称“元四家”。明代画家戴进的绘画清逸含蓄，成为浙派画家的代表人物，文学家、书画家徐渭是中国水墨、花鸟画派的开创者之一。明末清初画家陈洪绶以画人物见长，所作人物画精妙入微，冠绝当世。而清代“扬州八怪”之一、杭州人金农，其绘画也独创一格。

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使浙江的工艺美术比以往大为拓展。杭绣、杭剪

等地方产品都享有盛誉。尤其是明清以来，以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和黄杨木雕为核心的“浙江三雕”，更是明清浙江工艺美术的代表。

明清两代，浙江除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外，书院和藏书楼的建设也是当时浙江文化的一大特点。浙江著名学者吕祖谦、陈亮、叶适、王守仁、黄宗羲等都曾主持过书院或在书院讲学，阐发自己的学术主张，并培养嫡传门生，由此形成了历史上闻名全国的“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四明学派”和“姚江学派”。而这一时期，以天一阁为代表的私家藏书楼建设在浙江兴起，遍及省内，影响全国，从而奠定了浙江“藏书大省”的地位。

二

近现代浙江文化，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改革是其发展的主旋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浙江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从1840年到1949年的百余年中，浙江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涌现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如林启、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孙诒让，以及鲁迅、陈望道、郑振铎等。他们学识渊博，学术造诣深厚，富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并致力于兴学育人，启迪民智。

在文学领域，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艺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郁达夫等建立创造社，主张艺术表现自我。特别是郁达夫写的《沉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小说集。之后，茅盾以《春蚕》、《林家铺子》、《子夜》三部小说，奏响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旋律。除小说外，浙江文学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也颇有成就。仅20世纪20年代，浙江就涌现出一大批不同风格、流派的新诗人和散文家。如1922年在杭州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新诗社团湖畔诗社，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以殷夫为代表的红色鼓动诗等。

在艺术领域，近现代除了李叔同、夏衍、周信芳、盖叫天、袁雪芬等浙籍艺术家在音乐、话剧、电影、越剧领域卓有成就外，最引人注目的当是浙江的美术创作。

清末以上海为中心的画家群中数浙籍画家最多。从赵之谦始，既有以任熊、任薰、任伯年为代表的“三任”，更有吴昌硕等成为海派画坛的中心人物。而当时“海派四杰”中就有浙江的任伯年、吴昌硕、蒲华三人。此外，以黄宾虹、丰子恺、潘天寿为代表的浙江现代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力图变革创新，给作品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创造出了自己的艺术个性，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量级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的6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扶持下，依托浙江强劲的经济支撑，浙江的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文物博物方面，浙江文物古迹众多。全省现有杭州、绍兴、宁波、衢州、临海、金华、嘉兴等七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杭州六和塔、岳飞墓，宁波保国寺、天一阁，绍兴古纤道、大禹陵，衢州南宗孔氏家庙，湖州飞英塔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百三十二处，数量居全国第五位。

浙江又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较早的省份。现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二百多个，国有馆藏文物六十三万余件。浙江省博物馆的前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始建于1929年，是中国早期建立的博物馆之一，现馆藏文物十万余件。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馆、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均具有鲜明特色。

浙江的藏书之盛久负其名。今天的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湖州嘉业堂、瑞安玉海楼等著名藏书楼在保存古代文献、培养人才、促进学术研究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浙江又是中国兴办近代图书馆较早的省份之一，全省现有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九十三个。已有百年历史的浙江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藏书量达五百三十二万余册（件）。

浙江戏曲、曲艺的艺术底蕴丰厚，是中国古老南戏的诞生地，至今拥有越剧、婺剧、绍剧、瓯剧、甬剧、姚剧、湖剧、新昌调腔、宁海平调等十多个地方戏曲剧种，以及杭州评话、绍兴莲花落、宁波走书、温州鼓词和金华道情等六十多个地方曲艺曲种，其中浙江昆剧团创作演出的昆剧《十五贯》成为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戏曲改革“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典范。越剧则是浙江的代表性戏曲样式。新中国成立后,广大越剧工作者不断改革创新,使越剧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剧种之一。较有影响的剧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祥林嫂》等。改革开放以来,以“小百花”为代表的浙江越剧群体迅速崛起,创作演出了《西厢记》、《五女拜寿》、《陆游与唐琬》、《红丝错》、《藏书之家》等优秀剧目。

浙江的书画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当代又出现了黄宾虹、潘天寿、沙孟海等书画大家。成立于1928年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为国立艺术院),是中国最早的美术教育高等学校,现已成为我国培养美术人才的“摇篮”之一。创建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中国最早的以研究印学为主的学术团体和金石书画专业出版机构,100多年来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浙江浓郁的乡土风情孕育了绚丽多姿的民间艺术。以东阳木雕、青田石雕、黄杨木雕和瓯塑为代表的“三雕一塑”蜚声中外。剪纸、刺绣、染织、编织和灯彩丰富多彩。以嘉兴秀洲、宁波慈溪和舟山为代表的农民画和渔民画充满了生活气息。而浙江现当代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则更呈现出特色鲜明、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到2011年,浙江省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达一百八十七项,数量居全国第一。

浙江人文荟萃,名人辈出。自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巨匠鲁迅、茅盾,教育家蔡元培,著名科学家茅以升、竺可桢、钱学森、陈省身,以及李叔同、王国维、夏衍、艾青、徐志摩、陈望道、马寅初、金庸等名家大师均为浙江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国两院院士(学部委员)中,浙江籍人士占了近五分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又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2008年,又颁布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纲要(2008—2012)》。同时,自“十一五”起,正式颁布施行文化建设五年规划。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文化投入逐年增加,文化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文化法规不断健全,为文化惠民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省把改善文化民生、推进文化惠民作为文化建设的重中之

重,以构建覆盖全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抓手,大力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率先在全国实现省级博物馆、图书馆免费开放,多项文化惠民指标全国领先。目前,覆盖全省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初步形成:建成了一批标志性重点文化设施;全省现有二十个全国文化先进县、三十六个省级文化先进县、四百八十四浙江东海文化明珠乡镇;县级文化馆、县级图书馆、乡镇文化站建设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公共文化服务队伍日益壮大,全省农村活跃着一千三百多支电影放映队、一万多支业余文保队伍、五百多家民间职业剧团、近二十五万支业余文体队伍以及五十多万名业余文体骨干;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逐步增强;“十一五”期间,全省共送九万多场次演出、一百一十多万场次电影、一千零十五万册图书到基层农村,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蓬勃发展的文化事业,为浙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文化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而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

就文化的生成结构与生成状态而论,区域文化的特色主要是文化生态环境的差异,影响区域文化特色的最大因素则是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

就浙江文化的自然地理环境而论,浙江文化的鲜明特色是多元化。

以地理文化加以划分。浙江靠山临海,有以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为主体的水乡文化、以金衢丽盆地为主体的山地丘陵文化,以及以甬台温舟为主体的海洋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浙江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色,从而使浙江文化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特征。而在浙江文化中最具普遍性与代表性的当推水文化。

就浙江的水文化来看。尽管浙江历来有着“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但浙江境内江河湖海浑然一体。是水联系着浙江的东西南北,是水养育了浙江儿女,是水造就了浙江文化的生生不息,充满生机。在浙江的区域文化中,依赖于水的浸润与滋养,浙江文化的特征得以彰显,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

景观和文化景观”^①。

在浙江的水文化中，除了遍布全省的人文内涵极其丰富的众多湖泊、河流之外，还有浙江的海洋文化更具意义。

浙江海洋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区域内海岸线总长更居全国之首。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具有开放性、创造性、交融性、互补性的特征。因此，建立在海洋文化基础上的浙江文化，具有内生的开拓创新、开放进取精神，具有眼界开阔、富有活力的特性，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气度。

从大湖大河到大江大海，浙江的水文化彰显出鲜明的“水性”特征：

“水的柔性赋予浙江文化柔慧智巧、开放兼容的文化魅力；水的动性给予浙江文化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文化力量；水的灵性养成浙江文化敢于冒险、重利事功的文化个性”^②。而水的灵秀、明净、睿智、深邃，则更赋予了浙江人聪慧、勤奋、细腻，富于活力和韵致的人文性格，使“浙江文化又展现出了柔而不屈、富有灵气、善于变通的水文化个性”^③。千百年来，浙江先民在利用水、与水和谐相处以及与水的拼搏中，孕育了智慧与文明。水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深深影响着浙江人的品格生成与劳动创造，不断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涵”^④。

以地域文化加以划分。浙江又有以杭嘉湖平原为主体的吴文化、以宁绍平原为主体的越文化、以金衢盆地为主体的婺文化，以及以温丽两地为主体的瓯越文化。

就浙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吴越文化看。“吴越文化从纵向上看，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反复碰撞中发展的；从横向上看，吴越处在我国传统的大陆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两大板块的交锋地带，这就使得其文化具有海陆两种成分，并进而发展成传统的伦理本位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两种性质的交流和融合”^⑤。与此同时，浙江东西南北地域又由于自然、经济、社会生活的差异，其文化形态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在浙江多元化的地域文化中，呈现更多的还是文化的包容性特征。

首先是移民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包容。从浙江的社会环境以及浙江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浙江区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移民文化

那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性特征。长期以来“浙江处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交流的前沿，时常得以沐浴外来文化的清新之风”^⑥。“持续性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融合与碰撞，及其形成的多元价值与文化并存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单一价值信仰体系的盲从，以及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谋生手段的固守，有利于人们形成宽容的文化心态，保持活跃的思想状态以及对新事物的敏锐意识”^⑦。因此，浙江文化又有着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融会贯通加以发展的优良传统。

不仅如此，“浙江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又由于浙江人多地少，且偏于一隅，为开拓生存空间，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形成了强烈的向外发展的冲动。除了遍布全国的浙籍学子外，还出现了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绍兴师爷。近代以后，又有大批浙人侨居国外，例如在欧洲著名的青田侨民。另一方面，由于浙江的人文氛围与青山绿水，又以杭州为中心，形成了文化凹地，集聚着大批的文化名人，对浙江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⑧。

正是由于浙江的海洋文化、移民文化与外来文化，不仅提炼了浙江人“眼界开阔，思维敏捷，创新进取，富有活力的精神”，而且还凸显在多层次、多方面的对外交流，汲取他人之长为我所用方面，“浙江人不固守家园，而是不断开拓进取，不断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于越民族或是被迫，或是自发的频繁迁徙，培养和锻炼了他们的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善于汲取的品格和精神……浙江人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对新思想的接受和容纳上……这种思维敏捷，兼具开拓、创新进取精神的文化特征，使得浙江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学等方面人才辈出”^⑨。

其次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包容，表现出雅与俗的共赏、共存与共融的特点。在浙江的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以名士文化与学术文化最具影响。浙江的大众文化则以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最具代表性。千百年来，浙江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沟通，在观念上通过“事功”思想达到了一致，在渠道上则是通过浙江发达的耕读文化方式，实现了雅与俗的共赏与共存。

在浙江，“一个社会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不是相互隔绝的两大文化体系，而是同一文化的两种样态……在发达、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浙江民众逐步形成了崇尚务实、注重功利、乐于经商的价值观念和行为

方式,形成了市场意识敏锐,敢于尝试新的生产方式,勇于探索新的谋利路径,善于捕捉商机的个性特征,以及一整套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知识、技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众文化更是洋溢着鲜明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气息”^⑩。正是这样一种文化风尚,形成了浙江文化自南宋以来,更多地关注民生、反映民生、“以人为本”的传统特色。

就浙江文化的社会历史发展而论,浙江文化的鲜明特色是个性化。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说:“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孕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综观浙江文化千百年来走过的道路,我们不难发现,“浙江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路径、生产生活方式、多次人口迁移和文化交融激荡等等,造就了浙江文化独特的风格和底蕴”^⑪,使得浙江文化具有了以下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是自主自强的创新精神。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造就了具有创业精神的浙江人,培育了浙江人自主、自强、自立的生活态度,自我发展的创业意识、开拓创新的个性精神、富于创造的意志品格。“浙江在发掘自身内在优势,探究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源泉的过程中,提炼出并大力弘扬‘浙江精神’,自觉发挥它的经济创造力、社会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浙江民众以创业为荣的精神风气,使浙江人‘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创造了‘温州模式’、‘义乌奇迹’等等”^⑫,“自主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思维品格,构成了浙江人在经济改革中致力于制度创新,实现体制外增长的精神动力”^⑬,形成了浙江文化中自主自强的创新精神。

二是坚毅刚强的拼搏精神。自然资源匮乏的生存环境“塑造出了浙江人既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硬气和韧劲,又有滨海人勇于开拓、富于

冒险的气魄和胆略”^⑭。浙江精神，不仅激发了浙江人民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而且陶冶了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的品性。这种坚毅刚强的拼搏精神“反映到人的生存性格上，面对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浙江人既不消极沉沦，听从命运的摆布，也很少表现出燕赵之士那种慷慨激昂的刚烈之气，而是‘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充分发挥自己敏于机变和富有韧性的特长，去克服困难，实现自己既定的最终目标”^⑮。尤其是在现当代，“浙江企业家为了创业，求得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席之地，他们想尽千方百计，走过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在创业的过程中，严酷的竞争环境迫使他们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不怨天尤人，不灰心丧气”^⑯。浙江人民正是靠着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艰苦创业，形成了浙江文化中坚毅刚强的拼搏精神。

三是求真务实的“事功”精神。“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念，孕育了浙江人的务实性格。“功利主义和自然人性观构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观基础，浙江人讲究实际、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浙江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⑰。注重实效、实事求是的“事功”精神一直是浙江学术思想的传统。而务实的实践，更使浙江人养成了“鄙薄空谈，崇尚实干；轻视说教，追逐实利”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追求。“义利合一，这是务实的根本落脚点。正是基于这一价值判断，浙江人民以善于生产经营著称，在明末清初，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近代以后，宁波帮在上海崛起；改革开放以来，更成为市场大省”^⑱。长期以来，浙江民众在“事功”精神的熏陶教育下，形成了“干在实处、关注细节”的精明、务实意识，更生成了浙江文化中注重诚信的优良品德。

四是“工商皆本”的重商精神。自古以来，浙江人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求富愿望，孕育了浙江人的经商意识，形成了浙江人精明的商业头脑。“重利事功、货殖为重的商贸文化传统，使历代浙江人乐于经商，善于经商”^⑲。而注重商业性的“工商皆本”思想，更使浙江的文化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塑造出了浙江民众乐于经营谋利，且善于捕捉商机的生存个性”^⑳。这种“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文化性格，赋予浙江人在适应市场机制中胜人一筹的素质和优势”^㉑。

五是厚德崇文的人文精神。“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哺育了具有聪明才智的浙江人。底蕴深厚的文化积淀，造就了浙江人“崇尚柔慧，厚于滋味”

的人文情怀。

浙江自古重教兴学蔚然成风，有着尚学的理性精神。尊师重教、喜文好学，是浙江文化的重要传统。而“浙江之所以是文化之邦，最根本的表现在于：自古以来，浙江逐渐成为全国的人文渊薮，思想家、学者众多，人才辈出。这是浙江社会发展的产物，又推动着浙江社会以及全国的社会发展”^②。浙江人厚德崇文的人文精神，造就了浙江文人婉约、活泼而又不失豪放、敦厚的风格；浙江人柔慧灵活、刚柔相济的处世方式，造就了浙江人善于商谋、智巧灵变的文化品格，造就了浙江商人强烈的“民本”思想和“富民”意识；而浙江人深刻的忧患意识、大众情怀，更造就了浙江众多志士仁人为民族的复兴呐喊，表现出了鲜明的革新思想和反传统精神。因而“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同样也是浙江文化重要的生命能量。

浙江文化鲜明的个性特征，除以上五个方面外，浙江经济对文化的促进作用，也是浙江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为浙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强大的支撑。社会的进步、财富的增加、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的文化建设。

与此同时，浙江文化又对浙江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说：“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浙江的文化精神“始终流淌在浙江老百姓的血液之中，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这种文化基因，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蓬勃发展。”^③

总之，以上这些浙江文化的个性特征，培育了浙江人的道德和品格，形成了浙江人的思想和精神，推动着浙江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正是基于以上所述，《浙江文化地图》试图以图带文、图文并茂的方式，全面梳理浙江的历史文化资源，整体而又简约地介绍浙江的文化遗产、历史名人、发展脉络和建设成就，全貌而又概要地展示浙江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为关注浙江、希望了解浙江、研究浙江的人们提供可资学习参考的材料。

注释

- ① 罗昌智《浙江文化的“水性”特征》，《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 ② 罗昌智《浙江文化的“水性”特征》，《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 ③ 何显明《浙江精神：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力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第10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④ 罗昌智《浙江文化的“水性”特征》，《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 ⑤ 张佑林《现代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力探源》，《财经论丛》2005年第2期。
- ⑥ 何显明《浙江精神：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力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第10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⑦ 何显明《浙江精神：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力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第10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⑧ 丁晓强《浙江文化与浙江精神三题》，《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 ⑨ 余德余《浙江文化简史》第16—18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⑩ 何显明《浙江精神：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力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第11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⑪ 汪岩桥、陈海红《浙江文化和浙江企业家精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
-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研究课题组《浙江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特征之二》，《钱江晚报》2007年10月19日。
- ⑬ 张佑林《现代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力探源》，《财经论丛》2005年第2期。
- ⑭ 何显明《浙江精神：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力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第10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⑮ 何显明《浙江精神：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力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第10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⑯ 乐承耀《略论浙江精神》，《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5期。
- ⑰ 张佑林《现代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力探源》，《财经论丛》2005年第2期。
- ⑱ 丁晓强《浙江文化与浙江精神三题》，《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 ⑲ 罗昌智《浙江文化的“水性”特征》，《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 ⑳ 何显明《浙江精神：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力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第11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㉑ 张佑林《现代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力探源》，《财经论丛》2005年第2期。
- ㉒ 丁晓强《浙江文化与浙江精神三题》，《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 ㉓ 课题组《文化传统与浙江精神》，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第29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